



金门大桥与国际乒联

四年一个轮回，世界杯下个月又要开踢了。做体育经济方面文章的一定会找到最有力的证据：体育赛事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是多么强啊，甚至带来革命性的进步。现场直播促进电视的普及，从标清到高清再到如今的4K，转播技术的进步促成了电视机的更新换代，云云。

对比世界杯，5月上旬刚刚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世乒赛无疑是冷清多了，除了东京以外，就是在中国，能够关心“国球”并始终收看电视转播的人也不会太多。这也是由乒乓球这项运动的特质决定的，它永远不可能像足球那样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尽管国际乒联的会员比国际足联还要多）。去世乒赛的记者也知道单纯报道比赛意思不大，就把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提前卸任拿出来大书特书，话题当然离不开他

不是什么都需要变，仅仅为了改变某种格局就频繁变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 何不器

任期内对乒乓球运动所作的种种变革。对沙拉拉我并无恶感，实事求是地说，他所采取的变革措施中有些还是必要的，比如小球改大球，比如11分制，都是为了适应电视转播的需要。这电视转播商都是势利眼，足球踢90分钟，哪怕踢了延长期，再到罚点球，他都没意见。网球一场接着一场，能从白天打到后半夜，电视镜头就始终盯着那块场地不眨眼，也没有过怨言。什么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就不行了，就得给我在多少时间内打完，要不就自己关起门来玩去吧。所以这些项目都要变化要改

革，但国际乒联的问题就在于改得太多太频繁了，让人有点无所适从，甚至造成了某次改变导致一些著名运动员退役的结果。大家都说这些改变全是为了限制中国运动员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忘了“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强者比弱者更经得起折腾，结果反而造成中国运动员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我们常说“穷则思变”，也都知道这话出自《易经》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却因为后人的活用忘了它的本意并非是因贫穷而是因为穷尽。贫穷不代表你不能

有快乐的生活，穷尽才说明你走错了路不得不改弦易张。读唐鲁孙的《说东道西》，1981年，旧金山金门大桥因常年维护入不敷出，将过桥费从1块钱改为1块2毛5。于是大桥人车拥塞，几乎寸步难行。市民反映说是因为找零钱太慢造成的，有人便建议还改回收1块钱。仅试行一天，交通便畅通如前，政府决定过桥费恢复为1块钱。唐先生由此感慨管理者从善如流，我从中还看到变化必须具备合理性（顺便说一句，据美国《侨报》4月7日的报道，金门大桥过桥费现在为7块钱，已经采取自动收费系统，汽车过桥不再需要停车缴费）。

从金门大桥当年的例子与国际乒联的例子相互佐证，不难看出，很多时候，不是什么都需要变，仅仅为了改变某种格局就频繁变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母亲的唠叨

当越来越多的70后、80后、90后享受着技术的发展，他们的母亲却更多承受着压力

□ 华挺

“要不是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才不愿意来北京呢！亲戚朋友都在老家。”母亲一边给小蒋夹菜，一边说，“当初让儿子在南方找工作，可他偏要留在北京……”

我已经记不得母亲是多少次讲这番话了，反正不少于20遍了。每当母亲开了一个头，我就知道她下面要说啥。母亲很少单独跟我唠叨这个话题了，因为她知道“木已成舟”，我已经很难回去了。

高考填报志愿时，母亲让我填复旦或是浙大，我理解，家乡人喜欢气候饮食文化更相近的上海和杭州，然而我怀揣着闯荡梦想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并立志要扎根于此。于是，大学四年，“回南方找工作”成了母亲在电话中或是假期回家时跟我唠叨的主题。可是，大四毕业时我最终选择了留在北京工作。那一天，母亲哭了。

这是一个迁徙成瘾的年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宁静，让更多的人流动起来。求学、工作、结婚，无数中国人离开了家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定居，旅游、出差、过年，又有无数的国人为了各种原因行走在旅途中。然而，迁徙总是适合于年轻人，我们不再年轻的母亲要么选择留守家乡，要么随儿女到新城市定居，还有的就是在家乡和儿女或是多个儿女之间来回迁徙。

从2008年迁徙到北京居住，母亲的抱怨一直很多。然而，她老人家唠叨最多的话题还是房子：“幸亏当初让你买房早，不然现在怎么买得起”“2009年房价跌的时候还是应该咬咬牙再买一套”……当初我毕业留在北京后，她吃完就立马催我去买房：“北京要开奥运会，房价肯定要涨，赶紧去看吧。”正是在她的不断唠叨下，我放弃了靠自己赚钱付首付的念头，在父母的支持下买了房。事实表明，母亲的眼光还是英明的。

这是一个以房为奴的年代。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大部分城市中普通民众的梦魇，阻碍了母亲们到另一个城市和儿女们团聚。在北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多少母亲为了儿子的一套婚房而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又有多少母亲为了女儿的婚事而和无房的未来女婿唠叨。悲欢离合，有时就因为一套房，追求房子，成为了母亲心中对儿女幸福的寄托。

母亲不是死脑筋，她懂得改变。小区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人，母亲努力和他们聊天、交朋友；为了能更好交流，她对着电视练习普通话；为了了解北京，她订了一份新京报，每天认真研读，还把重要的新闻挑出来画上圈，留给我看。于是，母亲的唠叨有了新话题：今天哪个邻居家发生了什么，昨天北京有什么新闻，明天会不会堵车……

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的年代。手机能让我们每天都能和母亲聊天，互联网能让我们和母亲视频对话，高铁能让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内赶回老家和母亲团聚。当越来越多的70后、80后、90后享受着技术的发展，他们的母亲却更多承受着压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们的人生大都遭遇了太多的艰辛和不易，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和起伏。因此，她们会有更多的唠叨。

然而，无论是唠叨家乡、美食，还是空气、房子，或是儿女的工作、婚事，母亲唠叨的中心永远是儿女。她们渐渐老去，唠叨的话题也渐渐集中到儿女的身体健康：“不要太忙，不要太累”、“多锻炼身体”。而我现在，最关心的也是母亲的健康，盼望母亲在老家的医保能早日和北京连通结算，盼望着在北京看病能方便些。

劝退裸官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让官员怯于贪腐，就必须让公众监督

□ 于中谷

近日，广州市委原副书记方旋提前5个月退休的消息，再次让“裸官”进入公众视野。相关评论纷沓至来，“异口同声”地对准了一个问题：被劝退的“裸官”者清白吗？

中性的理解是，“裸官”就是“裸体做官”，意思就是妻儿都在境外，自己一人“无牵无挂”、独自在国内当官。

经考证，“裸官”的原初含义是“裸体贪官”。这出自2008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一案宣判后的讨论。这就不只是“裸体做官”的行为了，而是含有贪念的犯罪事实。当时，一篇题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炙手可热。

有人将这种逃避策略称为“分步出逃法”。对付“裸体贪官”，一般都是以“追

逃”为主。因为一旦东窗事发，他们就可以抽身而逃。据说，近30多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卷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人均卷款1亿元。

先“裸”后逃，已经成为外逃官员的惯常做法。这样的结果是外逃钱物难追回，在逃贪官难制裁。

还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家人在国外，自己落单，没有“家”的感觉；有四处吃“野食”的习惯，能贪则贪，能捞则捞；随时可以“飞”走，没有“覆巢之下”的后顾之忧。

“裸体做官”行为存在贪污腐败隐患，对此当严肃看待，相关部门早已作出了明确规定。今年1月下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有一条，对于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

为了防范“裸体做官”变质为“裸体贪官”，制度的笼子确实扎得紧了。方书记的被劝退，有可能成为公开报道的第一个因“裸官”而被“劝退”的官员。

上课莫刷屏

一颗迷失于手机的心灵会正确地面对生活的贫乏和枯燥吗

□ 李尚飞

高校课堂大学生“刷屏族”有增无减，有的学校近100人的课堂，除了一少部分学生还算认真听讲，大部分学生都在低头不停地刷屏。大概是忍无可忍，有些大学下了规定，定时关闭校内教学区域免费提供的无线网络信号。

对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置若罔闻而专心于刷屏，很难说是借助手机在学习专业知识；课本放在眼前而视若无睹，很难说是利用手机在解决一个学科问题。那么，不论刷屏是为了什么，有一点至少是肯定的：这样的行为，势必与专业无关，与学科无关。

这种不良的上课习惯，很长时间以来都为部分明智之士所诟病：荒废大好时光不懂

得汲取知识，浪费学习机会不懂得提升能力，耗费大量精力不懂得提高修养。然而，我从许多学生道说的共同的刷屏原因中，窥见了值得我们格外警惕的一种现象。

“手机放眼前，不看忍不住。”“坚持十分钟不刷开它都做不到。”“其实看了也没什么意思，可就是忍不住。”这些把玩手机原因如出一辙：不知什么时候，许多的大学生成为了手机的奴隶，不但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手机上，而且他们的心理也因为手机的存在而变得焦躁不安，难以宁静；他们在上课，但他们的思绪却是纷乱的，意念却是茫然的，甚至心性也是不安的。

“学须静也”，不驰骛于外物，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都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小成就的人都特别强调的观点。儒家思想中将关于为学的品性归结为七个字，即“知止定静安虑得”，“得”是结果，而其中的“知止定静安虑”六条，则无不与摒除外界的干扰、保持一颗凝定的心灵有关。不能达到这六条，则便无所谓“得”了。就学问而言，这七个字可以说有着普遍的意义；就生活而言，它也体现着深刻的哲理。试想，一双沉溺于手机的眼睛会去关注周围的现实世界吗？一颗迷

四合院牵手皮影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是现代社会一个新话题

□ 李佳霖

美国导演拉瑞的皮影戏《蝴蝶恋人》开演了。该戏改编自中国经典爱情故事《梁祝》，演出地点是什刹海皮影文化主题酒店那传统牌坊式的皮影戏台。有点儿东北味的配音，加上颇具动画效果的皮影，竟把这出悲剧演出了些诙谐的味道。

在《蝴蝶恋人》的导演美国人拉瑞看来，虽然皮影这种古老的艺术在世界各地都是走向衰落，它既不是电影也不是歌剧，人要自己融入其中，才能完整地表达。《蝴蝶

恋人》是他在中国导演的第二部皮影剧。几十年来，拉瑞为研究皮影曾去过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最后来到了皮影艺术的发源地——中国，开始与什刹海皮影文化主题酒店合作。

皮影与四合院的牵手，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什刹海之源公司的总经理裴武认为，胡同里的四合院是稀缺资源，但如今的民宿出租、民俗展示、餐饮等，都不足以体现四合院的文化定位。而什刹海这个国际型旅游景区、这个幽深的胡同，一定要有什么载体能把它推广出去。皮影戏正满足了这个要求，因为它集绘画、戏剧、雕刻、音乐等艺术于一身，又具备很强的互动性，是很好的推广载体。同时，把北京胡同深处最有特色的老四合院改造成文化底蕴深厚的皮影文化主题酒店，这种跨界融合不仅创新了传统酒店的新模式，也为走向衰落的传统民间艺术找到



小而美的范例

企业要追求对社会的改变,“喜愿面包”就是一个小而美的范例

□ 杜昱至

我在台湾旅游时发现，国父纪念馆外代售的一种“喜愿面包”很受欢迎。店员介绍说这种面包来自彰化，工作人员大多为残疾人士，他们活得有骨气，不接受慈善捐款、不申请政府补助，用自然的食材保证消费者吃得安心、健康，在市场竞争中争取自己的尊严。

她还告诉我们，“喜愿面包”的创始人辞掉在大企业的高薪职务，一心一意通过“制作面包来陪伴身心受限的朋友”，盈余用于企业的发展，股东不参与分红。

又健康，又便宜，还很感人，为什么不尝尝？我在感动感慨之余掏出钱包时，不禁想到一个问题：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企业存在的原因就是为股东赚钱。无论利润还是分红，都是市场对企业的一种考核，是对企业的一种约束。考核和约束是不可或缺的，但那还不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就如同吃饭不是活着的目的，加油不是开车的目的。吃饱了饭的我们应该琢磨着干点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他人的事；加满油之后，我们要驾车去那些想去的地方。如果本来倒置，就会催生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的行为。

诗人纪伯伦认为：“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什么样的“爱”拥有如此巨大的推动力呢？这就是对社会责任追求要先于对盈利的追求，也就是首先要推动社会进步。在任何国度，我们都需要成为一位好的公民、竭尽所能地为社会作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讲，公司更需要做一个好“公民”。企业的责任是对于社会整体福利（不只是股东的个人福利，还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福利）的关心。

那么，企业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必须守住社会公众利益这条道德底线；二是通过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因为，企业的职能就是通过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的机会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时也为本机构服务。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机会的过程中，最有意义的机会可能不在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而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社会创新。100年前，福特通过创新，引入汽车生产线，把汽车这种有钱人的玩具变成了大多数人的交通工具。40年前，只有大型机构才用得起计算机，比尔·盖茨通过创新，使计算机迅速普及……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这就是企业改变社会的方式。

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无疑要创新、要创造价值、要富于冒险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追求对社会的奉献甚至改变。“喜愿面包”就是一个小而美的范例。希望能看到更多“喜愿面包”式的企业出现。

